霸权衰退、公共品供给与全球经济治理*

程永林　黄亮雄

【内容提要】 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美国霸权是否必然会衰退？美国可能会做出哪些策略选择？中国等新兴大国又该如何认知与应对？回答上述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侧重于描述性的定性分析和经验性的对策研究，这导致在分析霸权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本质联系和影响机理、理解治理目标与大国的策略选择上的解释力和逻辑性不足。作者基于霸权收益与公共品供给均存在预算软约束等现实，通过建立和运用博弈论模型深入探讨了霸权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影响机制与应对之道。研究证实：第一，霸权国相对实力越强大，越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霸权收益，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第二，霸权国相对实力越强，越倾向于不断索取剩余效用，不劳而获的偏好越强烈。第三，霸权国必将陷入公共品供给困境，效用衰减和霸权衰退难以避免，霸权国只有与其他大国合作提供公共品才能维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稳定。作者建立了从公共品的供需角度分析霸权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互动机制与内在约束的理论分析框架，为解释美国的霸权政策选择和提出中国的策略应对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分析工具，并给出了相应的博弈策略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 全球经济治理；霸权收益；公共品供给；预算软约束；博弈模型

【作者简介】 程永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广州　邮编：510420）；黄亮雄，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广州　邮编：510641）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8）05-0131-18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5ZDA01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4BGJ04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本文修改稿曾在第八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上宣读，感谢与会学者的宝贵建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李青、会计学院林冰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　问题的提出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深刻总结了过去五年来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的深入展开：中国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系列领导人峰会，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习近平还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① 然而问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又会如何维持自身的制度话语权和霸权地位？它们能否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自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以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为标志，将美国优先和反全球化作为公共政策选项。美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中频繁采取单边主义、实用主义政策，用一系列行动挑战脆弱的全球治理体系，试图借此重塑国际经济规则、掌握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主导全球治理领域的变化趋势。2017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共 33 次提及中国，认为当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同时国家间的权力平衡正朝着对美国不利的方向发展。为此，报告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② 2018 年 1 月 30 日，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将会建立新的、更为有利于美国的、公平互利的贸易关系和贸易协定，并明确将中国与俄罗斯称为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战略对手。③

面对上述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回答如下关键问题：第一，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美国霸权是否必然会衰退？第二，为了维系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霸权，美国会做

---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028/c1001-29613514.html，访问时间：2018 年 4 月 27 日。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访问时间：2018 年 4 月 27 日。

③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state-union-address，访问时间：2018 年 4 月 27 日。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出怎样的策略选择？第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认识与应对美国的策略？回答上述问题需要研究各主要国家行为体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国际环境中、博弈各方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会采取何种博弈策略。同时，若想在现有全球治理格局中更好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中国也需要思考如何参与设计最优契约以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帕累托优化或改进、激励博弈各方展开持续合作。

总体来看，可能的解答途径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分析，即基于国家理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假设，通过构建模型分析美国与世界主要大国或国家联盟之间的博弈，求得达成博弈均衡的约束条件和均衡解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博弈各方的策略选择。对此，里卡多·卡巴列罗（Ricardo J. Caballero）认为全球经济治理需要考虑解决全球经济运行失衡和分配不公。① 拉杰·德塞（Raj M. Desai）等人认为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格局的调整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但是由于经济体差异和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区域经济治理要比全球经济治理更为有效。② 徐建炜、姚洋则认为现有国际产业分工与利润分工严重失衡，这一全球性失衡可能与美元的主导地位无关，相关经济治理的关键是重组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金融体系。③

二是实证分析，即通过界定霸权衰退的具体定义构建相应指标、搜集数据和案例进而展开定量分析与案例检验，据此来判断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能力、权力和影响力等指标是否显著衰退。为此，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课题组通过系统考察和比较世界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的经济、金融、贸易和科技指标发现，在 2015 年至 2030 年间中国贡献全球公共品的能力及其影响力将不断强化，而美国贡献全球公共品的能力、意愿及其影响力则会相对弱化。④ 黄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的分配方案为基础数据，通过测算绝对 Banzhaf 指数和 Coleman 指数发现，采用以 70%为界的多数获胜规则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权力，而美国则会丧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绝对否决权。⑤

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全球公共品的供需均衡，通过博弈论来验证在现有全球经济

---

① Ricardo J. Caballero, Emmanuel Farhi and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Global Imbalances and Low Interest R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8, No.1, 2008, pp.358-393.

② Raj M. Desai and James R. Vreel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Multipolar World: The Case for Regional Monetary Fund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3, Issue 1, 2011, pp.109-121.

③ 徐建炜、姚洋《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载《世界经济》，2010 年第 3 期，第 3—4 页。

④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未来 10—15 年》，载《改革》，2014 年第 5 期，第 58—59 页。

⑤ 黄薇《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计算：以 IMF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为例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2 期，第 198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治理体系中的美国霸权是否进入了衰退周期，分析美国为了维系霸权会采取哪些占优策略，进而探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博弈策略和可行政策。

二　霸权演替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的学理争论

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霸权稳定论及霸权演替规律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根据是否认为霸权演化存在周期，可以将学界分为两个主要流派。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为代表的一派从权力政治和权力平衡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行为的自助性和国际权力的平衡性是重复现象，国际体系内最多存在波动的连续性，但不会有周期性循环。以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国际权力演化具有多种有规律可循的周期，国际体系会因霸权国的更迭呈现出周期性特点。① 另一派的代表性理论是霸权稳定论，其核心观点认为是霸权维系着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和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霸权国通过提供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安全等全球公共品以维持霸权。但是由于公共品提供的边际收益递减和其他国家的搭便车行为，霸权国的全球公共品供给势必难以为继，从而导致霸权衰退、诱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不稳定。② 为此，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提出了后霸权理论，即认为在霸权国家衰落后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体系和秩序的稳定。③ 在此基础上，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提出了单极稳定论，其认为美国作为霸权国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确立了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权，这使得全球处于“单极力量主导下的稳定与和平”。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所采取的包括战争在内的手段都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而也是“合法”行为。④

关于霸权衰落的机理和影响，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一派支持霸权必将衰落的观点。吉尔平从收益递减的角度论述了霸权衰落的原因，他认为一旦扩张的成本与收益之间达到平衡，保护成本的增加就会导致霸主收益的减少，维持现状就会变得

---

①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25页。

②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④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1999, pp.5-41.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更加困难，霸权国将会趋于衰落。① 周丕启认为霸权衰落的根源在于治理合法性的危机，霸权的衰落则遵循固定的逻辑过程：当霸权出现合法性危机时，其势必借助强制性权力来维持现状，从而导致维护成本增加，这引发霸权国的实力进一步消耗，最终导致霸权衰落。② 刘世强认为领导国家虽然能够通过建立霸权垄断国际资源的分配，但这也会导致内部需求的膨胀。当自身实力难以支撑这种需求时，领导国家就会形成霸权依赖，进而呈现出相对衰落的趋势。③ 屠新泉等通过分析多哈回合前后美国结构性权力的变化及其影响，发现美国在工业生产、金融、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结构性权力大幅减弱，美国霸权的这一衰落造成了多边贸易体系权力安排的失衡，这是产生多哈回合困境的根本原因。④ 另一派则反对霸权必将衰落的观点。李晓等认为美国作为新型霸权国不仅远没有进入衰退周期，而且依然在国际金融、贸易、政治与安全体系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学界现有的霸权演替理论难以有效解释这一现象。他们指出美国某种权力资源优势的衰减或暂时下降经常容易被误读为美国霸权的整体衰退，这种分析忽视了同时期美国其他权力资源优势的强化，未能充分认识美国霸权体系中锋利权力、黏性权力与软权力资源之间的相互支持。⑤

毋庸置疑的是，当前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其各项经济指标正在相对下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并呈现出若干特征：全球经济去中心化趋势明显，国际经济与政治的联动性增强，新兴经济体保持着赶超势头，发达国家则出现了逆全球化。与此同时，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面临一系列治理困境与难题：第一，它无法有效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即是例证。第二，全球经济治理的各机构和平台缺乏协调和问责，治理效率不高。第三，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无法有效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利益和权力要求。保建云在研究中发现，霸权与全球经济稳定性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对于确保国际社会的秩序和世界经济运行的稳定而言，霸权国的存在是中性的。⑥

---

① 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157 页。

② 周丕启《合法性与霸权的衰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3 期，第 50 页。

③ 刘世强《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势衰落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5 期，第 41 页。

④ 屠新泉、苏骁、姚远《从结构性权力视角看美国霸权衰落与多哈回合困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8 期，第 29—30 页。

⑤ 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大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1 期，第 136—138 页。

⑥ 保建云《美国维护还是破坏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基于霸权收益计算的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 期，第 27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世界银行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构和平台，很早就认识到全球公共品的重要性。其指出全球公共品包括跨国并具有较强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规章、政策和体制，它们对于解决全球贫困和发展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其持续供给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①

但是问题在于当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时，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安全保障机制仍然缺少足够的支撑力量。尤其是在没有霸权国或者霸权国衰退时，不仅霸权国越来越不愿意提供全球公共品，其他国家也会出于理性计算和自利需求更多地选择“搭便车”而非合作提供国际公共品。这必然会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越来越失序和缺乏稳定性，最终每个国家的利益都会因此受损。为此，庞珣从国际公共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出发，运用博弈模型分析了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提出了设立合理的门槛机制以减少搭便车行为以及在国际公共品供给中采取不平衡合作、层叠性合作等解决思路。②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全球公共品供给日益减少，供给不足的部分需要由区域合作来适时弥补。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与能力参与全球公共品的供给？中国在区域和全球层面提供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等公共品又是否会导致中国陷入霸权竞争，成为美国及其霸权集团遏制和打压的对象？中美的公共品竞争又是否会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失序和混乱？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应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度参与者，应该积极提供全球公共品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改变长期以来的被动地位。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有条件推动变革；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必要参与变革，需要以此争取合理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中国无须将自己定位为霸权挑战国，而应采取增量变革，做好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补充和完善。裴长洪认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增强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为此，中国一方面需要持续增强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改革国内的经济体制，使其更适应参与制定全球规则的需要。③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中国当前提供的主要国际公共品。“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全球层面提供公共品，在国际社会推广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补充。亚投行则完善了现行国际发展融资体系，有助于加快全球金融治

① World Bank Development Committee, “Poverty Reduction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ssues for the Word Bank in Supporting Global Collective Action,”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EVCOMMINT/Documentation/90015245/DC-2000-16%28E%29-GPG.pdf，访问时间：2018 年 4 月 27 日。

② 庞珣《国际公共产品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7 期，第 42 页。

③ 裴长洪《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载《经济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4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理改革。① 对此，冯维江指出中国可以继续加大对“一带一路”和“朋友圈”的公共品投入，增加与美国的主要盟友间的相互关系专用性投资，同时对调整对美专用性投资存量保持慎重。②

目前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键事务上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而日本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关键事务上也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总持股比例仅为 6.45%，日本和美国则分别持有 15.62% 和 15.51%。中国的较低投票权意味着其在这些国际经济治理机构的决策中影响力有限。亚投行的成立和运行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这将影响乃至改变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与经济治理体系。③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对亚投行进行了抵制。其原因在于亚投行有助于中国提升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对美国的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霸权产生了威胁。欧洲国家选择拥抱亚投行则是基于对世界经济秩序演变趋势的战略判断，反映出欧盟各国试图维持并巩固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进而参与塑造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意愿。④

当然，对中国提供公共品的尝试也不乏批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佩奥拉·斯帕奇(Paola Subacchi)就质疑中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行为，认为这会威胁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作用将适得其反、导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甚至存在引发金融风险等负面影响。⑤ 这一观点说明美国及其盟友对于中国努力发挥负责任大国和作用、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不断贡献新的全球公共品的做法存在明显的偏见、恐慌和排斥。对此，张宇燕指出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既是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基本前提，也是推动全球治理变得更为公正合理的必由之路。⑥ 徐秀军认为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想更为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建设、议题设置和构筑经济安全防护网上加大投入。⑦

---

① 涂永红、王家庆《亚投行：中国向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的里程碑》，载《理论视野》，2015 年第 4 期，第 63 页。

② 冯维江《中美权力博弈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进——基于公共产品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11 期，第 128 页。

③ Hong Yu,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6, No.105, 2017, pp.359-360.

④ 徐刚、司文、陈璐《欧洲加入亚投行的原因和影响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5 期，第 9 页。

⑤ Paola Subacchi, “The AIIB Is a Threat to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3/31/the-aiib-is-a-threat-to-global-economic-governance-china，访问时间：2018 年 4 月 27 日。

⑥ 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9 期，第 8 页。

⑦ 徐秀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38—39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关于美国霸权衰落与否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不仅在国际学界争论激烈，在中国学界也没有定论。回答上述问题的现有研究在分析霸权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机制、理解治理目标的设置与大国的策略选择方面解释力不足。此外，现有研究在方法论上侧重于描述性的定性分析和经验性的对策研究，论证逻辑不够缜密。有鉴于此，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解释逻辑。

三　霸权、公共品供给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联系机制

本文在综合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基于霸权收益与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通过建立和运用博弈论模型来深入探讨霸权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影响机制与应对之道，特别是霸权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其中的博弈策略和政策选择。

（一）基本假定与理论假说

为了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借鉴国内外成果设置了如下基本假定：

假定 1：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国际社会中不存在管理全球事务的世界政府，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采取自助策略，自助基础上的冲突与斗争、合作与共赢是全球治理中的常态。①

假定 2：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但国家是主要行为体。原因在于国家对全球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家拥有其他行为体所无法拥有的权威、资源和能力，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②

假定 3：国家是理性自利的行为体。国家基于理性自利和风险控制的原则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寻求投入—产出均衡与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受到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③

假定 4：国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存在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共同

① Helen V.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7, No.1, 1991, pp.70-71.

② 徐秀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10 期，第 58—59 页。

③ Herbert A. Simon,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69, No.1, 1955, pp.99-102.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利益，其是主权国家进行有条件的国际合作的动力，也是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前提。①

假定 5: 制度非中性。制度非中性是普遍存在的，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均是如此。制度非中性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不平衡分配。②

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建立“霸权实力消长—公共品供需结构变化—国家效用变化—博弈策略选择”的博弈论分析框架。该模型有助于厘清霸权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联系。这一推导过程融入了公共品供给需求分析和国家间实力消长的函数效用，使分析更为接近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以下四个基本假说:

假说 1: 霸权国相对实力越强，越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霸权收益、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假说 2: 霸权国相对实力越强，越倾向于不断索取剩余效用，不劳而获的偏好也越强烈。

假说 3: 霸权国必将陷入公共品供给困境，效用衰减和霸权衰退难以避免。霸权国只有与其他大国共同提供公共品才能维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稳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我们尝试通过构建博弈论模型予以深入分析。模型背景如下: 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一个国家想要维持霸权必须向全世界提供公共品，但是其自身也能从中获利。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是少数，代表博弈一方。以中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是多数，代表博弈的另一方。霸权国家无论如何强大，如果其不能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国际市场机制、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安全保障等公共品来确保全球经济治理有序稳定运行，那么其他国家将拒绝接受其霸权地位，该国也将因此失去霸权及其收益。这与制度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较为相似，国际社会中的众多国家会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推举一个或多个国家为全体提供公共服务，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被授权国将根据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获取相应的酬劳或收益。授权国是委托人，而被授权国则是代理人。委托人的问题在于如何根据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激励代理人选择对委托人最为有利的行为。③ 在我们的博弈分析框架中，霸权国是代理人，其他国家则是委托人。霸权国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领导者，其他国家则类似于国际体系中的选民。我们设定了一个

① 陈伟光、王燕《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0 期，第 18 页。

②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 年第 2 期，第 98 页。

③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03—408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反映霸权国维持霸权能力的指标，进而深入分析霸权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关系、影响机制和博弈策略的选择集合。模型的具体刻画与推导过程如下。

（二）完全信息情况下的静态博弈模型分析

设定当前霸权国的预算约束线为：$\tau\bar{y}=\theta g+r$

其中，$\bar{y}$ 是世界各国的收入。τ 是霸权国剥削其他国家的比例。g 是公共品的提供状况。r 是霸权国家在位的收益。θ 既代表提供公共品的成本，也是霸权国国家能力的度量。霸权国的能力越强大，越能以更少的成本提供公共品，θ 就越低。

其他国家（具有代表性的一般国家）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U(g(\theta),(\theta),\theta)=\bar{y}-\theta g(\theta)-r(\theta)+H(g(\theta))$$

效用包括两部分，即交给霸权国后剩下的收入和从公共品中获得的收益。

定义 $g^*(\theta)$ 为当供给成本为 θ 时公共品的最优供给水平，并设定：

$$H'(g^*(\theta))=\theta$$

这一简化源于拟线性的偏好，使得 $g^*(\theta)$ 独立于 r。

当前霸权国的效用函数为：

$$E(v_I)=r+p_I R$$

R 表示霸权国继续维持霸权的收益，p_I 是它继续维持霸权的概率。

在完全信息的模型下，其他国家可以观察到 θ。

假设其他国家按如下策略决定是否支持霸权国继续维持霸权：

$$p_I=\begin{cases}1 & \text{如果 } U(g(\theta),r(\theta),\theta)\geqslant(1-\eta(\theta))\varpi(\theta)\\ 0 & \text{其他}\end{cases}$$

先定义 η 为霸权国维持霸权的能力，这也可以解读为霸权国的实力。本来，如果霸权国给予其他国家的效用大于 $\varpi(\theta)$，后者才会支持该国的霸权地位，即 $p_I=1$。然而，霸权国可以威慑或者强迫其他国家，使后者降低对效用的索取。降低的比例为 η，且 $\eta'(\theta)<0$。由此可见，霸权国相对其他国家的实力越强大，就越能迫使其他国家屈服并接受自身的霸权地位。也就是说，模型有效验证了假说 1：霸权国实力越强大，就越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公共品并维持霸权收益。但是我们注意到，要震慑其他国家并维持自身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霸权，霸权国也需要损失一定的效用。

对于霸权国来说，它的决策为：

$$\max\quad r(\theta)+p_I R$$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text{s.t}\quad p_I = 1,\text{仅当}\ [\bar{y} - \theta g(\theta) - r(\theta) + H(g(\theta))] \geqslant (1-\eta(\theta))\varpi(\theta)$$

先考虑 $p_I=1$ 的情况，由于 $g(\theta)$ 并没有进入目标函数，霸权国会尽可能地放松约束方程。那么 $g(\theta)=g^*(\theta)$，所以 $r(\theta)=\bar{y}-\theta g^*(\theta)-(1-\eta(\theta))\varpi(\theta)+H(g^*(\theta))$。于是，霸权国通过维持霸权将总共获得如下收益:

$$\bar{y} - \theta g^*(\theta) - (1-\eta(\theta))\varpi(\theta) + H(g^*(\theta)) + R$$

可见，霸权国相对其他国家实力越强大，维持霸权所能获得收益就越多。相反，如果其他国家推翻霸权，即 $p_I=0$，霸权国就会尽可能地获得更高的 r(没有维持霸权的收益)，$r=\bar{y}$，即获得 $\bar{y}$。这就验证了假说 2: 霸权国相对实力越强大，越倾向于不断索取剩余效用，不劳而获的偏好也越强烈。由此必然出现对实力的过度追求，同时大力压制现实或可能的竞争对手，防止霸权收益流失或受损。

再分析 $\varpi(\theta)$ 的确定。$\varpi(\theta)$ 的最小值应该是霸权国是否维持霸权的临界值，即当 $\bar{y}-\theta g^*(\theta)-(1-\eta(\theta))\varpi(\theta)+H(g^*(\theta))=\bar{y}$ 时的值。此时，

$$(1-\eta(\theta))\varpi(\theta) = H(g^*(\theta)) - \theta g^*(\theta) + R$$

于是在完全信息下，最优的 $r^*=\bar{y}-R$(霸权国的收益没有减少，其他各国越富裕，霸权国的收益越大)。此时，$\theta g(\theta)=(\tau-1)\bar{y}+R$

于是，$g'(\theta)=-\dfrac{g(\theta)}{\theta}<0$，即霸权国能力越大，提供的公共品越多。

其他国家获得的效用为:

$$(1-\eta(\theta))\varpi(\theta) = H(g^*(\theta)) - \theta g^*(\theta) + R$$

那么，

$$\begin{aligned}\frac{d((1-\eta(\theta))\varpi(\theta))}{d\theta} &= H'(g^*(\theta))g^{*\prime}(\theta) - \theta g^{*\prime}(\theta) - g^*(\theta)\\ &= \theta g^{*\prime}(\theta) - \theta g^{*\prime}(\theta) - g^*(\theta) = -g^*(\theta)\\ &< 0\end{aligned}$$

这说明霸权国能力越强，其他国家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获得的效用越高。而且霸权国的能力越强，越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公共品并维持霸权收益。

(三) 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

把模型拓展到动态状况，把霸权国的目标函数改为在时间 $t=0$ 时，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E(v_I) = \sum_{t=0}^{\infty} \beta^t r_t$$

简单而言，霸权国一旦失去霸权，其以后的霸权收益均为零，即如果 $p_t = 0$，$r_{t+k} = 0$，对所有的 $k>0$。

预算约束修改为：

$$\tau_t \bar{y} = \theta_t g_t + r_t$$

即要求霸权国每一期都要实现预算平衡。

在此情况下，其他国家决定是否支持霸权国继续维持霸权的策略为：

$$\begin{cases} p_I = 1 & \text{如果 } U(g_t(\theta_t), r_t(\theta), \theta_t) \geqslant (1 - \eta_t(\theta_t))\varpi(\theta_t) \\ 0 & \text{其他} \end{cases}$$

在任意一期，霸权国能选择 $r_t = \bar{y}$。令 $R_{t+1} = \sum_{t=1}^{\infty} \beta^{t-1} r_t$。那么，与对霸权国的激励相容的约束是：

$$r_t + \beta R_{t+1} \geqslant \bar{y}$$

如果上述条件得不到满足，霸权国就会榨取其他国家的所有收入。所以，其他国家的最优策略应为上式决定的 (p_I)。令 r 为每期中当前霸权国的收益，假设每期固定，此时

$$R_{t+1} = \frac{r}{1-\beta}$$

然后，得到 $r = (1-\beta)\bar{y}$

其他国家的博弈策略要求为：

$$(1 - \eta(\theta))\varpi(\theta) = \beta\bar{y} - \theta g^*(\theta) + H(g^*(\theta))$$

然后霸权国的每期获益为：$r(\theta) = (1-\beta)\bar{y}$

这意味着霸权国的收益没有减少，同时其他国家越富裕，霸权国的收益越大。

同理，

$$\begin{aligned} \frac{d((1-\eta(\theta))\varpi(\theta))}{d\theta} &= H'(g^*(\theta))g^{*\prime}(\theta) - \theta g^{*\prime}(\theta) - g^*(\theta) \\ &= \theta g^{*\prime}(\theta) - \theta g^{*\prime}(\theta) - g^*(\theta) = -g^*(\theta) \\ &< 0 \end{aligned}$$

这就再次验证了霸权国的能力越强，其他国家越富裕，霸权国的收益就越高，而其他国家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获得的效用也越高。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 不对称信息情况下的博弈模型分析

进一步,我们将模型由完全信息拓展为不对称信息,假设其他各国不能观察或知道提供公共品的成本 θ。则它们是否支持霸权国维持霸权的博弈策略为:

$$p_I = 1,\text{当且仅当 } U(g_t(\theta_t), r_t(\theta), \theta_t) \geqslant (1 - \eta_t(\theta_t))\varpi(\theta_t)$$

再考虑霸权国的策略。为了满足其他国家,霸权国会选择:

$$r(\theta) = \bar{y} - \theta g^*(\theta) - (1 - \eta(\theta))\varpi(\theta) + H(g^*(\theta))$$

此时,霸权国获得的总收益为:

$$\bar{y} - \theta g^*(\theta) - (1 - \eta(\theta))\varpi(\theta) + H(g^*(\theta)) + R$$

而且需要满足: $U(g_t(\theta_t), r_t(\theta), \theta_t) = (1-\eta_t(\theta_t))\varpi(\theta_t)$

这意味着霸权国一方面需要继续提供公共品,另一方面获得的霸权总收益却在不断下降。霸权国寻租设租的边际成本在上升,国家的相对实力则在不断耗散和下降。当其在经济上逐渐无力负担提供公共品的成本时,那么霸权国就难以维持霸权,即 $p_I = 0$,霸权国会选择 $r = \bar{y}$,然后得到 $\bar{y}$。因此,霸权国能继续维持霸权的条件是:

$$H(g^*(\theta)) - \theta g^*(\theta) - (1 - \eta(\theta))\varpi(\theta) + R \geqslant 0$$

定义 θ^* 为:

$$H(g^*(\theta^*)) - \theta g^*(\theta^*) - (1 - \eta(\theta^*))\varpi(\theta^*) + R = 0$$

综上所述,可以推导得到其他国家的效用为:

$$U(g_t(\theta_t), r_t(\theta), \theta_t) = \begin{cases} (1 - \eta_t(\theta_t))\varpi(\theta_t) & \text{当 } \theta \leqslant \theta^* \\ 0 & \text{当 } \theta > \theta^* \end{cases}$$

它们的预期效用为:

$$E(U) = \int_{\bar{\theta}}^{\theta^*} (1 - \eta(\theta))\varpi(\theta)\, dF(\theta) + \int_{\theta^*}^{\bar{\theta}} 0 \cdot dF(\theta) = F(\theta^*)(1 - \eta)\varpi$$

因此,在不对称信息情况下,霸权国为了维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和体系稳定,势必陷入公共品供给困境。那么霸权国要么通过战争等非经济手段强制性地维持霸权收益,要么被迫放弃霸权地位,将权力让渡给体系内更为强大、更具竞争力的新兴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彼此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霸权国发动战争的成本和代价高昂,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或冲突的概率因而大为降低。因此,霸权国实力衰减、权力衰退与国家间的权力转移是多轮反复博弈的必然结果。霸权国继续维持霸权的条件是: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当霸权与多个大国并存时，只有分享权力和收益、共同提供全球公共品，才能保证霸权国和其他国家的效应和收益增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才能保持稳定。这验证了假说3。

四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策略选择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持续性影响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霸权治理和公共品提供能力构成了重要制约和内源性挑战。一方面，美国不断通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来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引发了与其他大国、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激化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和宏观经济政策冲突。此后，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美国优先的政策，直接拒绝承担对国际社会的公共品供给责任。其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议等多边机制，还在2018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支出。这一系列政策选择表明美国已经在调整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博弈策略，同时也深刻暴露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这使得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正在发生剧烈转型，其意味着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治理模式可能逐渐转变为合作治理模式。①

为了巩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基于自利需求和战略需要不断交替使用单边和多边主义政策，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能源署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为舞台，试图继续维持霸权治理模式。然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二十国集团(G20)机制正在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临时倡议转变为推动全球经济合作的正式平台，这种演变反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权力和力量重心正在发生转移。从南北关系来看，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心正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转向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合作。另外，在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共同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外，美国还尝试过主导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TPP等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这一举动进一步验证了前文观点，即伴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国际范围内的权力分化，美国将寻求新的霸权治理思路和发展模式。

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和演化逻辑来看，其角色和地位发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考虑和安全利益需求来参与全球政治安全治理，陆续加入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组

① 徐秀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77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织，但是相对忽视全球经济治理。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初期到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将战略重心聚焦于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上，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也逐渐从被动调适转为主动参与。从 2001 年至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呈现出群体性经济崛起和影响力上升的态势，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却相对衰落。这导致逆全球化现象频现，大国关系出现深度调整，现有国际经济体系面临强烈冲击，大国综合国力消长和国际权势转移的态势日趋明显。依托自身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逐渐增加。

中国应该如何理性认知与应对当前形势？如何才能更为积极、主动和审慎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如何增强中国对国际治理机制的影响力、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要回答上述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有效解决治理体系中权力垄断和动态竞争的矛盾。米尔斯·凯勒(Miles Kahler)认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是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受益者，它们没有挑战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动力和内在需求。但是它们也具有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各自偏好和需求，会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中谋求更多的权力和有利于自身的议程设置。① 安德鲁·库珀(Andrew Cooper)认为传统和非传统型的中等强国在世界性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势必越来越处于一种从属性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单极全球治理秩序。② 蒲晓宇认为美国对于维护既有霸权地位具有强烈偏好，但与此同时，不够自信的美国又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风险，双方为不必要的竞争耗费资源，而结果也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地位排序。③ 冯维江认为稳定的国际权力构架是霸权国向世界提供的有效公共品，但是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公共品供给体系的依存度却存在结构性的不断下降。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两种前景：一是形成双中心式的、以大国对峙为核心的平衡体系；二是形成联合中心式的、以新型大国关系为核心的国际权力结构。④ 基于发展和安全利益需求，中国应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定适宜的博弈策略和政策选择。具体可概括为如下四点：

第一，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美国霸权的衰退和更替是逻辑演化的必然，也是现实发展的趋势。但是霸权国降低提供公共品的成本、提升霸权收益的理性选择将会延

① Miles Kahler, "Rising Powe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Negotiating Change in a Resilient Status Quo,"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3, 2013, pp.711-729.

② Andrew F. Cooper, "Squeezed or Revitalised? Middle Powers, the G20 and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4, 2013, pp.963-984.

③ 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9 期，第 48—49 页。

④ 冯维江《中美权力博弈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进——基于公共产品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11 期，第 106、121 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缓霸权的衰退。中国需要保持战略耐心和定力,因为美国霸权的衰退必然会是一个反复较量和多轮博弈的复杂过程。作为博弈一方,美国会采取各种自利主义行为,例如交替使用单边和多边主义策略来降低国际公共品的供给成本,想方设法让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分担治理风险和责任。这一方面为中国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提供了契机,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所要分担的国际公共品的提供成本也必然会不断增加。因此,国际权力和收益的增加需要匹配自身的综合国力。同时还要考虑投入—产出比的动态变化,以降低透支国家实力的风险,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获取与自身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制度权力与国际话语权。凡事过犹不及,盛极易衰、强极易辱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二,对于美国霸权的历史作用、可能的博弈策略和全球经济治理发展的必然规律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政策准备。虽然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但是其在维护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稳定方面依然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根据上文的博弈模型推演,美国为了维持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维护体系稳定,正陷入日益严重的国际公共品供给与需求间结构失衡的困境,美国实力的衰减和领导力的衰退是博弈的必然结果。因此,常规、长期、可控的冲突与博弈将会成为中美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互动的趋势和常态,对此中国需要做好战略预判和筹划。在当前美国霸权正处于战略收缩时,中国的博弈策略不宜为急于寻求填补因美国收缩而产生的战略空间和空白地带。面对当前的全球治理形势和中美博弈态势,知雄守雌、避其锋芒、静待时机仍不失为上策。否则,必然会引发霸权国及其盟友的强烈反弹,甚至会直接将中国定性为霸权挑战国,导致中国与霸权国及其盟友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持续对抗。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演化规律不以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只有分享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力和收益、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提供全球公共品,才能获得更多的总体收益、保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稳定。

第三,作为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受益者,中国在博弈策略选择中的定位理应是现有体系建设者和维护者,而非挑战者和颠覆者。中国需要防范美国采取利己主义的单边政策,甚至不排除美国会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谋划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创造性破坏,进而制定出更有利于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和新规则。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国家综合实力和治理能力等核心要素。其中国家综合实力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国家治理能力是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目前,中国正以不同于西方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快速现代化,这可能引发双重效应:一是对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抵制效应”,二是基于中国经济崛起与和平发展经验而引发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学习效应”。中国发展模式要谋求与西方发展模式的长期共存共荣、平等对话和相互借鉴，这意味着伴随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将会形成倒逼机制。中国只有率先实现国内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现代化，才能形成一套能够被其他国家广泛学习和效仿的软实力体系。因此，中国无须急于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影响力，更没有必要主动承担与自身权利不匹配的国际公共品的供给责任、过度消耗国家实力与战略资源。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中国和它们在全球治理层面仍然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和需求，需要求同存异、务实合作。谨慎务实地稳健推进亚投行、“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等增量改革是当前的优势策略。当然，要想提升中国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和利益，不可能只是等待美国等西方强权国家的“恩赐”、误判或犯错，而是要以自身实力为基础进行适宜的斗争、合作与博弈，这也是一种相对稳健的优势策略。

第四，中国要善于借助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和平台，通过不断寻求共同利益、采取非零和博弈策略将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不断转化为体系中的制度权力、塑造力和影响力。为此，中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主要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和平台的各项职能议程，这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国、G20 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中国在其中要致力于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机构的民主化改革，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发言权，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国际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能力。在国际贸易上，中国应当增强自身参与和改革全球贸易体系的能力，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与东南亚国家建成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谋划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尤其是非洲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乃至自由贸易区，将中非合作作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实践平台和策略试验基地。中国还应当抵制以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全球贸易规则和政策的合理化，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定价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更多的主导议题，构建多边共赢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

五　结论

美国霸权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是否必然衰退？为了维系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霸权，美国可能会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和政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又应如何认知与应对？若想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更好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中国应该选择这样一种博弈策略和政策选项：其既能够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又能实现全球经济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治理体系的帕累托改进，从而激励博弈各方展开持续性合作。

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霸权国实力越强大，越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公共品并维持霸权收益。但是在威慑其他国家以维持霸权的过程中，霸权国也要损失一定的效用。第二，霸权国相对实力越强大，越倾向于索取剩余效用，不劳而获的偏好也越强烈。由此必然出现对霸权实力的过度追求、大力压制现实或可能的竞争对手，从而防止霸权收益的流失或受损。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其他国家越富裕，霸权国的收益就越高，而其他国家从现有霸权体系中获得的效用也越高。第三，霸权国为了保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霸权依赖和体系稳定，必然会陷入公共品供给困境。此时，霸权国要么选择战争等非经济手段继续强制性地维持霸权收益，要么被迫放弃霸权地位，将权力让渡于体系内更为强大、更具竞争力的新兴国家或国家集团。霸权国的实力衰减、权力衰退与权力转移是多轮重复博弈的必然结果。霸权国要想持续维持霸权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当霸权与多个大国并存时，只有分享权力和收益、共同提供全球公共品才能保障霸权国和其他国家获得更多的效应和收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才能稳定。

相应地，本文为中国提出的博弈策略和政策建议是：其一，虽然美国霸权的衰退和更替是逻辑演化和现实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会立即实现，相反会经过复杂的反复较量和多轮博弈，中国需要增强战略耐心和定力。中国在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时需要综合考虑国家实力、投入—产出比和战略透支的风险。其二，常规、长期、可控的冲突与博弈将成为中美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互动的常态，中国需要提升战略预判与谋划能力。知雄守雌、避其锋芒、静待时机仍然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上策。其三，中国是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受益者，博弈策略的定位是建设和维护现有体系，而非挑战和颠覆这一体系。中国需要防范美国谋划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创造性破坏，防止形成更有利于美国维护其霸权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和新规则。中国的占优策略是以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为核心目标，等待对手误判或犯错，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博弈策略、斗争与合作交替使用的权变策略，积极推进权力与责任相匹配的公共品供给的增量型改革。其四，伴随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将会形成倒逼机制。其要求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一套能够被大多数国家广泛学习和效仿的软实力体系。其五，中国要善于借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平台，通过非零和博弈将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不断转化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权力、塑造力和影响力。

（截稿：2018 年 2 月　责任编辑：肖　河）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nd an important means of maintaining world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However,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the IMF's economic forecasts on member counties are inevitably biased.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political economy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IMF forecast errors from the forecasting methods, the forecasting information and the political factors, and test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IMF forecast through the panel data analysi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IMF tends to make optimistic economic forecasts for countries that implement IMF-supported programs, and this economic forecasts bia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advanced economies. At the same time, we find countries vot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receive more optimistic forecasts from the IMF. However, the direct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country on the IMF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orecast error.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tests the effects of the data availability on the quality of forecasts using the IMF's Special Data Dissemination Standard (SDDS) and the World Bank's Statistical Capacity Indicator (SCI), and finds that improving the data availability of member countries is beneficial to improving the IMF's forecast accuracy. The IMF's forecast errors for major economies can also affect a country's forecast. Therefore, the paper propos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IMF's forecast by establishing more independent forecasting procedur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orecast data and improving the IMF's forecast accuracy for major economie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urveillance, economic forecasts, political economics

【Author】Xiong Aizong,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ecline of Hegemony,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heng Yonglin Huang Liangxiong (131)

【Abstract】Is it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U.S. hegemony to plunge into recession in the existing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What strategic options may the United States make for this purpose? What's the rational cognitive and strategic response for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powers? Existing research that addresses these issues focuses on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that lead to the insufficiency of explaining the essential linkages between hegemony and global eco-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nomic governance, impact mechanisms, governance objectives and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major power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major fa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hedging benefits and soft goods constraint in public goods suppl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egemony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mechanism and solution by establishing and applying game theory model. The research confirms that firstly, the stronger the relative power of the hegemonic power is, the more it can obtain the hegemony benefits at a lower cost so as to maximize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s. Secondly, the stronger the relative power of the hegemony power, the more it tends to continuously obtain the residual utility. Thirdly, the existence of hegemony can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existing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Fourthly, the hegemonic power is destined to plunge into the dilemma of supply of public goods. The decay of its effectiveness and the decline of hegemony are the inevitable results. Only when the hegemon power cooperates with major powers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can it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The article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inherent restraint of hegemony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analytical tools for explaining the choice of hegemon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strategic responses. It also offers the corresponding game strategy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hegemony income, public goods supply, budget soft constraint, game model

【Authors】 Cheng Yongli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uang Liangxio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Legac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Wang Zaibang (149)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